



世说新语

人生就是一场角色扮演游戏



《新周刊》第523期封面文章《游戏力:如何重估游戏价值?》中写道:“一切皆是游戏。”(约翰·赫伊津哈)

“游戏增强了我们身为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快乐、灵活和创造力,赋予了我们以意义非凡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力量。”(简·麦戈尼格尔)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角色扮演(RPG)游戏,出生地和属性随机,各种打怪技能需要不断打磨,前进的路上需要不断作出抉择,不同的抉择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局。

在缺乏游戏规则和游戏精神的今天,人人需要一点游戏力。没有游戏力的人,过不好这一生;没有游戏力的公司、城市和社会,便会失去创造力、突破力和亲和力。

是的,我们需要游戏力,但更需要“费厄泼赖”,让人人可以在规则之内,光明正大地公平游戏。

天赋与时局共同成就的齐白石



《三联生活周刊》第1003期封面文章《齐白石》中写道:1919年可以说是齐白石一生最艰难的一年。57岁的他为了躲避战乱离开湖南老家湘潭定居北京。

那时的齐白石还是个清末的乡下人,还没有成为“齐白石”。他此后将经历民国、军阀割据、抗战、内战,直至新中国成立,出身和时局让他早年贫穷,中晚年动荡。

齐白石又是幸运的,在来到北京前,他是传统乡村结构瓦解前的最后一代人,受益于赏识他的层层乡绅、地主。民国时期,西方思潮进入中国,陈师曾、林风眠、徐悲鸿等留洋知识分子一眼认出他的好,并帮助促成了他从民间画家到艺术大家的转变。

齐白石是天赋与时局共同成就的大家。“雅与俗”“艺术与商业”,这些艺术界永恒的矛盾,就这样被齐白石以“天然之趣”全部解决了。

对充满“障碍”的社会重新定义



《南方人物周刊》第564期封面文章《障碍中生长 心智障碍者家庭的漫长突围》中写道:《无尽夏日》,是重度自闭症患者东田直树在13岁时写下的故事。

那些如星状隐秘而闪耀的自闭症患儿的遐思,逐渐展露在大众面前,并经由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的翻译,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为无数自闭症患儿家庭带去力量。

在中国,没有太多人知道自闭症究竟是什么。许多人将它与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健康疾病划上等号,对与自闭症类似的病症,如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脑瘫等等,同样视如敝屣。

这个群体的存在常被误解,有时被有意地无视,被认为是“废物”,对社会没有有益作用,或被等同于没有思想的动物,因为他们的心智水平低于常人。

这个群体正以更丰富更多样化的面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他们包括智力发育迟缓、脑瘫伴有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人群、自闭症谱系人群等等不同类型人群,他们共同的功能性障碍体现在沟通障碍、学习障碍和社会互动障碍。

但他们表现出对融入社会的同等渴望。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正通过联结成更大的社群组织力量,试图对充满“障碍”的社会进行重新定义。

(林晨 供稿)

做一个勇于批判又敢于担当的人



开学典礼致辞

车浩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对一位普通教师而言,在全校开学典礼上致辞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相信每个致辞的老师,都会格外珍惜,甚至恨不得把他所有的人生经验和感悟,毕其功于一役。

一、学会做事 勇于担当

你能走到今天,来到北大学习,除了有自身的天分和努力外,也一定是承受了很多包括父母家庭在内的和来自外部世界的支持和奉献。但是,没有人可以,也不应该总是汲取和吸收,而应该对他人,对这个社会和世界有所奉献。

这些话,貌似是在毕业典礼上该说的话,但那时已经为时晚矣。学会担当,勇于任事,是你们在进入大学伊始就应当培养的意识。

相反,应当逐渐摆脱掉的,是那些可能把我们变成一个所谓“巨婴”的潜在陋习。这种巨婴,虽然已经过了十八岁,但心理滞留在婴儿期,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感恩之心,更不愿意去为他人做任何奉献。

二、学会怀疑 敢于批判

北大是研究学问的地方,学术之路上,最重要的科学精神,是怀疑和批判。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在系统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之后,还应当有进一步的自我要求。

要成为一个新知识的发明家,就不能做一个温顺地臣服在旧知识脚下的良民。这就需要怀疑的眼光,和批判的精神。古今中外各个领域中的大学者,都是对这个世界有着深切的好奇和怀疑,勇于批判和反抗学术权威,敢于挑战那些所谓的常识和通说。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是教师和学生的身份,在北大校园里,我们的天职不是批判和改造社会,而是运用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沉下心来去学习和研究。但是当有一天你离开校园,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只要你具有了这种不轻易妥协的批判精神,你就是一个思想独立的人,一个不盲从、不苟且、不惧权威也不媚俗、不愿安于所谓“平庸之恶”的人。

三、做一个既要敢于批判 也要勇于担当的人

这句话不是对前两句话的简单罗列,恰恰相反,这里面藏有一种深刻的对立倾向。只有理解并且掌控它,而不是被它所驱使,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卓越的人格。

一个勇于批判的人,往往也有强烈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心理,很难接受事物的瑕疵,因此不会轻易给人赞美和肯定。甚至对自己也未必满意,索性洁身自好,彻底不做事。相反,一个勇于任事的人,喜欢在一点一滴的具体事功中获得意义,不愿过多地批判甚至刻意回避现实的阴暗面,更愿意去发现现实的合理性,希望承担建设和改善的责任。

大家想过没有,当这两种人遭遇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一个把批判精神贯穿到底的人,可能放眼望去,会觉得:社会上遍地不公,无能之辈横行,自己不愿意同流合污,至于那些在体制内外闷声不语低头做事的人,简直就是“久居鲍鱼之市而不闻其臭”,整日里蝇营狗苟,浑浑噩噩,眼看着国家就要毁掉在他们手里,恨不得要他们进行正当防卫。

而一个只想着头头做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社会上整天空发议论,不干实事的闲人太多了,有些人就是不肯传播正能量,总是盯着那些体制和社会的不足之处,把它们夸大渲染,整日里叽叽歪歪,像个苍蝇一样讨厌,眼看着国家就要毁掉在这些冷嘲热讽的嘴巴上面,恨不得一巴掌扇过去,世界顿时清静了。

其实,也不必假设。这就是当下的现实。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和舆论场,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撕裂。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观点对立并不可怕,但

是,如果把观点的对立,进一步升级为彼此的仇视,最后造成共同体的撕裂,这不可能导向任何的历史进步,只会引起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养成的品格,会影响他的一生。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从今天开始,在学习生活中,就既要培养自己敢于批判的精神,也要锻炼自己勇于任事的作风。将来大家离开校园,承担社会角色时,是在朝还是在野,是批判者还是建设者,个人选择总是有所重心。但是,只要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有意识地同时培养自己批判者和建设者的精神品质,在他进入社会之后,就不会轻易地把与自己不同选择的人,视为仇视的敌人。

那时,当他作为批判者,发起猛烈批评的炮火,他也同时能够看到,这个社会光明的地方。批评荒唐,也肯定进步,能够对那些勇于任事的建设者给予理解和尊重。当他作为建设者,他能够正确对待批评的声音,能够把不同的意见,——哪怕再刺耳——也当作是对事业的鞭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插上自己的耳朵或对方的嘴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都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努力做一个敢于批判也勇于担当的人。先在自己身上,反复训练左右互搏,实现了这种人格的对立统一,才能扩充出一个真正的“兼容并包”的格局和胸怀。

大家始终要记住,我们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仅仅是一个批判者或者建设者,而是要能够引领批判和建设的人。因此,你们今天就要学会创造出自己身上的对立面,并容忍和尊重它;将来,你们才会接纳不同甚至对立的人,才可能带领和整合社会中不同的力量,让批判者和建设者一道,共同推动国家和世界的进步。

(本文为作者在2018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法律文明巡礼

体制内自我监督之弊

1808年“李毓昌被毒案”

吴杰 (福州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清代嘉庆年间查赈大员李毓昌(1772-1808年)任上殒命的案件,是清代最著名的冤案之一。案件诉至京师之后,引发朝野巨震,世人为廉吏枉死而扼腕哀叹,为恶官巨贪而唾骂不已,更为官场腐败而顿足捶胸。

查赈官任上殒命

李毓昌,字泉官,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苏。同年,江苏淮安一带罹患水灾,民人流离,饿殍遍地,朝廷下令放赈,救济灾民。两江总督铁保(1752-1824年)命李毓昌前往山阳县,查勘赈灾事宜。

某日,王仲汉在署宴请毓昌,借机谋毒毓昌。晚间,毓昌微醉而归,李祥以毒药置汤中,给饮于毓昌。毓昌入寝后,腹痛难忍,起床叫人,包祥、马连升趁机入室,配合以系带缢死毓昌,并伪造自缢现场。

皇帝谕旨严办

案发之后,李毓昌的族叔李太清至山阳县迎哀,检视遗物时,发现了半纸残稿,曰:“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大清大惊,对毓昌的死因感到怀疑,丧归故里后,家人开棺验尸,所刺银针均呈黑色,才知系遭人毒害而死。李太清赴京为侄喊冤,诉

至都察院,引得嘉庆帝高度重视,指令刑部重新会讯涉案人员。

山东按察使朱锡爵受命再次检验毓昌尸体,蒸骨验毒后,骨头呈中毒状,案验结果为:毓昌中毒未死,后被缢而亡。嘉庆闻之震怒,命斩包祥,处李祥、顾祥、马连升凌迟之刑,并剖李祥之心祭奠毓昌。淮安知府王毅处以绞刑。



▲ 李毓昌(1772-1808年)

山阳知县王仲汉处以斩刑。其他涉案官员或贬或革,都遭到了惩罚。嘉庆帝死后还写了《感忠诗》盛赞毓昌,并命树御诗碑于墓前,追赠毓昌知府衔,赐毓昌族叔李大清武举人。怜悯毓昌身后无子,嘉庆帝又下诏为其立嗣,并赐为举人。毓昌死后虽哀荣备至,然而又何尝不是清官廉吏之殇呢!

体制内监督之弊

清代惩贪之法,系统且繁复,清律“受赃门”开篇规定有“官吏受财”律,其文曰:“凡官吏因枉法,不枉法事,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赃止一两,俱不叙用。……”除此而外,该门中尚有“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物”“有事以财请求”“在官索借贷人财物”“家人索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科敛”“剽窃盗赃”“私受公侯财物”等罪名。律例规定密如凝脂,贪墨之风却烈烈不减,可见惩贪法的实效性出了问题。

惩贪法的实效性之所以出问题,关键在于它利用的都是体制内的自我监督,舆情和民情很难在惩贪过程中发挥作用。如本案所涉“冒赈”,清代条例规定:“赈济被灾饥民,以及蠲免钱粮,州县官有侵蚀肥己等弊,致民不沾实惠者,革职鞫问,照侵盗钱粮例治罪。督抚、布政使、道府等官不行稽查,俱革职。”又有则例规定:“督抚不将侵冒之员奏参鞫问者,降三级调用。倘督抚藩司道府州府不行稽查,使州县任意侵蚀者,俱革职。”其赈灾章程和惩贪立法,不可谓不严不密,然而冒赈之弊仍难杜绝,问题就出这些惩贪措施全部依循督抚、藩司、道府的自我监督。官僚体制盘根错节,上下左右互相牵制,贪案一旦爆发,其自我保护机制立即启动,惩贪法的实效性不打折扣才怪。

乾隆时期,曾降旨废除“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藉此,喋血法场的贪官不胜枚举。嘉庆法外求功,御制《义利辨》《崇俭诗》告诫群臣,以期收效止贪之效,举措种种,其成效甚微,是可想而知的,即使运用重典,贪墨之窟始终笼罩在大清王朝而挥之不去,原因不在于人心变坏,而在于规则没有发挥堵塞人心变坏之路的功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只有充分发挥舆情和民情的力量,惩贪规则才能不被官僚体制的自我保护机制扭曲,发挥出其实际效果。清代的这一历史教训,当亦可辐射于当代世界。